

中国经济增长 十年展望

(2013—2022)

寻找新的动力和平衡

刘世锦 主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中国经济增长 十年展望

(2013—2022)

寻找新的动力和平衡

刘世锦 主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 / 刘世锦主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长期增长” 课题组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086-3846-1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增长-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6811 号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 (2013-2022)

编 著: 刘世锦主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长期增长” 课题组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5.25 字 数: 43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846-1/F · 2835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本书编写人员

顾问：李 伟 刘 鹤

主编：刘世锦

专家组成员（按姓名拼音排序）：侯永志 隆国强 余 斌

协调人：刘培林 陈昌盛

其他作者（按姓名拼音排序）：

陈道富 方 圆 何建武 刘 涛 刘云中 马名杰

秦中春 任泽平 邵 挺 石 光 王金照 王 青

吴振宇 许 伟 许召元 张丽平 张 亮 卓 贤

目 录

导 言	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和平衡····· 刘世锦	1
	本书的研究背景·····	1
	如何理解和认识经济增长阶段转换·····	2
	如何认识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特点·····	4
	寻找新阶段的增长动力·····	5
	围绕新增长点谋划和推动改革·····	7
	若干说明·····	9

综 合

第一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景展望与“三大转型”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12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和所面临的问题·····	12
	未来 10 年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变动趋势和特点·····	14
	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同阶段的目标展望·····	18
	加快现代化进程必须着力推动“三大转型”·····	23
第二章	未来 10 年展望：潜在增长率下降，新增长阶段开启	
	····· 陈昌盛 何建武	28
	追赶型经济体经历高速增长期后，增速会呈现两类不同性质	
	的回落·····	29

当前中国经济回落具有混合特征，增长阶段转换已经开启	31
未来 10 年展望：转向中速增长阶段	35
2013 年中国经济增长展望：短期经济出现弱复苏	54

需 求

第三章	城镇住宅：需求峰值临近	许 伟 62
	典型工业化国家住宅建设与投资呈现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63
	中国城镇住房供给的总体情况	80
	按国际经验类推，未来 10 年中国住房投资预计将达到峰值， 投资增速将明显回落	85
	2012 年城镇住宅投资形势回顾和 2013 年展望	95
第四章	基础设施：后劲犹存的增长动力	邵 挺 100
	未来 10 年中国基础设施发展潜力	101
	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投资量：2012 年回顾及 2013 年 展望	115
第五章	汽车：进入普及期的次高速增长	王 青 129
	汽车需求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130
	2012 年市场走势回顾和 2013 年展望：调整基本结束， 向正常增长收敛	147
第六章	出口：增速下滑与结构升级	张丽平 吴振宇 159
	出口竞争力的含义及研究方法	160
	加入 WTO 后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	164
	未来 10 年中国出口情景评估	169
	2012 年中国出口回顾与 2013 年展望	171

供 给

第七章	人力资本：总量持续扩张，增速减缓	许召元 方 圆 176
	文献综述	177

	1990~2010年中国人力资本的测度·····	180
	未来10年中国人力资本维持正增长但增速将减缓·····	187
	2012年人力资本回顾及2013年展望·····	196
第八章	创新：实现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关键转换	
	····· 马名杰 石 光	199
	增长视角下的中国创新·····	200
	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若干特征·····	201
	构建创新水平国际评价体系·····	208
	中国创新水平的国际地位·····	211
	创新指数比较·····	221
	中国近期主要创新指标·····	228
	未来10年的中国创新展望·····	229
第九章	全要素生产率：从技术追赶向更多依靠自身创新过渡	
	····· 何建武	233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234
	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国际经验·····	236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回顾及未来10年展望·····	242
第十章	实际汇率：中期升值趋势不改，短期波动加大 ····· 许 伟	249
	追赶型经济体实际汇率变动的特征及启示·····	251
	人民币汇率中长期走势及其决定因素·····	260
	2012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和2013年汇率走势预测·····	264
产 业		
第十一章	农业：产出与消费的紧平衡 ····· 秦中春	270
	典型国家农业增长的经验事实·····	271
	关于农业发展预测的文献综述·····	288
	对中国农业发展进行预测的方法·····	293
	2013~2022年中国农业发展趋势预测·····	305

第十二章	制造业：踏上升级之路	任泽平	315
	制造业的内涵与分类		316
	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典型化事实		318
	中国制造业发展状况及国际经验对比		326
	未来 10 年中国制造业发展前景预测		336
	2012 年中国制造业发展回顾和 2013 年展望		344
第十三章	服务业：初露端倪的主导产业	刘涛	354
	未来 10 年中国服务业发展前景和趋势预测		355
	2012 年中国服务业发展回顾和 2013 年展望		382
第十四章	金融：加快向市场化转型	陈道富	388
	主要国家金融发展和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389
	中国未来 10 年金融发展展望		396
	2012 年金融发展回顾和 2013 年展望		419

区域和城市

第十五章	区域经济：领跑者更替与区域差距缩小	刘云中	428
	文献与事实		429
	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历史轨迹		431
	区域政策的导向		438
	区域经济发展 10 年展望（2013 ~ 2022）		440
第十六章	城镇化：质量重于速度	卓贤	447
	文献综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448
	如何认识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多维视角下的结构性分析		450
	加权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对城镇人口赋予不同权重		458
	2022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展望：基于农村可转移人口的视角		465
	消费增长：数量城镇化与质量城镇化的不同影响		47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78

资源环境

第十七章	能源：结构变化决定总量增长	王金照	484
	中国中长期能源需求展望		485
	2012 年中国能源需求分析及 2013 年需求预测		494
第十八章	水资源：节流开源应对紧缺态势	张 亮	497
	用水变化与经济国际典型化事实		498
	当前中国水资源利用的基本状况		505
	对 2013 ~ 2022 年中国用水量的推测		509
	主要结论		515
第十九章	土地：以提升效率满足发展需求	张 亮	518
	用地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国际典型化事实		519
	中国土地利用的变化特征		527
	对 2013 ~ 2022 年中国土地需求形势的预测		531
	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建议		533
第二十章	碳排放：强度降低带动总量增速放缓	刘培林	535
	碳排放的国际经验		537
	中国未来碳排放趋势预测		539
	2012 年中国碳排放回顾与 2013 年展望		545

导言

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和平衡

刘世锦

本书的研究背景

2008年，中国经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经历了短暂的滑落后迅速回升，到2010年初达到了一个高点。之后又开始回落，历时超过10个季度，到2012年第四季度后才企稳反弹。如何看待这一轮回落，仅仅是一个短期调整，还是反映了中长期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化？两年前，我们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会下一个较大台阶，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到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刘世锦等，2011）。刚提出时，质疑者甚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此问题上的共识逐步增加。

本项研究是上一项研究的延续。在逻辑思路，延续了增长阶段转换的分析框架；在数据上，继续使用以麦迪逊购买力平价指标体系为基础的数据库（Madison, 2008）。不同的是，我们将研究聚焦于未来10年，特别是当前和最近的几年。表面上看，这项研究是“预测未来”。这类研究首先遇到的是方法上的挑战。通常使用的是所谓“趋势外推法”，即用过去推测未来。如果说在经济增长处在相同阶段，增长动力和机制没有发生重要变化，在限定条件下，这种方法看起来还有些效果。但对中国这样正处大转型时期的经济体来说，基本上不大有效，如果一定要用，很容易产生误导性结果。借鉴国际上相同或相似增长阶段的历史经验，能够获取不少有价值的信息，特别是有关增长的规律性信息。但使用这类信息时也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与国际上其他经济体，包括大国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毕竟有着相当多的不同。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把有意义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情结合起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的真实增长历程，尤其是对

那些增长有重大影响的转折或“拐点”。在努力增加有关中国经济增长规律性知识的基础上，对未来增长前景作出推测。这正是本项研究试图企及的目标。

从这个含义上说，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规律性的理解比某个具体指标预测数值更有意义，也更为重要。尽管如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本项研究还是对主要的总量和结构指标给出了预测数值，而且没有采用流行的“情景预测法”。我们所顾虑的是，如果提出若干种情景（如3种乃至5种情景），对预测者本身是留下了“余地”，但读者往往搞不清楚哪种情景是“真”的，从而降低了“信息量”。本项研究中除个别场合外，只给出一种情景，也就是研究者认为可能性最大的一种情景。好在本项研究是一个连续的长期研究项目，下一个年度，我们将把时间后推一年，对下一个10年增长进行展望。这样的滚动研究就给我们提供了修正或纠正预测误差的机会，由此也可看到研究逐步深化、知识相应增长的过程。因此，本书只是一个长期研究项目的初始成果。

如何理解和认识经济增长阶段转换

现在回到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主题上，这里我想结合本项研究中的一些新成果，对此再作一些讨论。

在上一项研究（刘世锦等，2011）中，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以来的国际工业化历史经验进行了梳理，从中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也包括欧洲的德国，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11 000国际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平均降幅达到30%左右，有的降幅还要更大一些。对这样的结果，我们也颇感意外，于是开始考虑其后是否存在某种规律性。按同一口径测算，2012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9 000国际元，而中国的增长路径与上述成功经济体较为接近，依此推论，中国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两三年出现潜在增长率较大幅度的回落。

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讨论增多，部分讨论集中于供给因素，如中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如蔡昉，2012）。这无疑是重要的，供给面的变化将会对增长形成硬约束。同样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在既定技术条件和预算约束下，任何一种需求都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都是有边界限制的。即使供给能力充裕，当触及需求边界，也会形成产能过剩。目前人们已

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需要强调的并非短期的产能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长期需求峰值。一旦长期需求峰值出现，过去曾多次出现的短期过剩产能被长期需求增长所吸收的情景将不再出现，就会形成“真的”产能过剩。本书中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长期需求峰值的预测数据，如城镇住宅需求，2012年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长期需求的年度峰值约1300万套，预计出现在2015年左右，此后很可能保持在既有水平，或出现负增长；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建设，在东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其密度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今后一些年将基本保持略高于GDP的增长率；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住宅、汽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到近些年整个投资的一半左右，这些领域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

以上所说的是基于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的推论。回头看一下中国经济近年来增长的轨迹，呈现了一系列重要现象。首先，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投资、工业增加值和GDP等指标的增速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或超过了11000国际元的水平，增速回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回到以往高速增长轨道的可能性甚微，而投资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依托所在。第三，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风险加大，资产回报率降低，也从一个角度表明正在接近需求增长的边界。此外，这一轮增长回落并未伴随突出的就业压力，是否意味着以劳动力供给来衡量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总之，这些事实表明，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并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推论，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如何正确认识这一转换的问题。有人把这种变化视为中国经济的“衰落”乃至“崩溃”，也有一些舆论在“硬着陆”的题目下讨论这一问题。看来“认识问题”非同小可。

我们以为，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规律，按规律做事就是正确的。从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能够在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的发展水平上出现自然回落，是追赶型经济体成功的标志，因为已经较完整地吸收了高速增长潜力。这一点与更多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相比，会看得更为清楚。其次，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GDP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只是与持续增大的总

量基数相比，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例如，2000年时增长10%的新增量，到2012年只能推动2%或略多一点的增长；若要实现8%的增长，新增量至少要相当于当年的3倍以上。第三，今后一些年，为了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目标，居民收入增速有望超过GDP增速，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将会改善。还有，今后一些年即使增长速度降到7%或再低一点的水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依然可望如期实现；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届时按现价美元计算得到的中国经济总量有很大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人均收入水平有望踏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用“硬着陆”或“软着陆”等概念描述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容易产生混淆。中国经济正经历的是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转换，而非同一平台上的短期波动。此类概念较适合于后一场合，而在前一场合，使用此类概念易于产生这样的推论：既然已经“着陆”，接下来就应该再次起飞，重返高增长轨道。这显然容易产生预期误导。

如何认识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特点

国际经验表明，增长阶段转换往往不会一帆风顺。日本、韩国等就在这一时期出现过大的波动。其原因是，这一时期具有超过以往的内在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例如，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人们的预期产生混乱，情绪波动较大；短周期（存货调整等引起）变化与中长期周期变化相叠加，经常会听到一些相互矛盾的信息；企业、政府及其他行为主体易于保持政策惯性，调整滞后，如此等等。

从近期看，有两种易于出现、因而需要防止的倾向。一种是“推高”，试图回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在一些地方，政府换届后增长冲动上升，可能助长这种倾向。特别当短周期回升、中长周期依然向下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过度乐观的预期。有些机构对2013年增长速度的预测，似乎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另一种情况是“快落”。当短周期和中长期周期同向变化时，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快速下滑的可能性加大。2012年上半年一度曾出现这种状况。2013年，当短周期见顶回落时，尤其需要关注是否发生“快落”的问题。

表面上看，这两种倾向方向相反，但现实中很可能互为因果，成为一个连续过程。短期内人为推高速度，超过潜在生产率水平，出现通胀压力和金融风险。之后被迫调整，而一旦进入下行轨道，又可能出现“快落”，正所谓“大起大落”。

事实上，我们面临着不同的速度组合。一种是大起后大落；另一种是速度适中，但稳定性、可持续性较强。几年下来算总账，可能还是后者的平均增速较高。发展仍然是硬道理，现阶段解决中国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提出潜在增长率下降，强调增长阶段转换，并非不重视增长速度，而是为了在认清增长规律的基础上，有效保持必要且可能的增长速度。这几年我们讲稳增长，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稳”的必要性更强，难度也更大，更应强调“稳”字当头。能稳住，不出现大的起落，就是很大的成功。

因此，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宏观政策的主要基调是“托底”而非“推高”。能保持7%~8%的增长就很不错，如果出现过热苗头，应及时刹车；另一方面，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止“快落”上，做好必要的政策和项目储备，一旦问题出现，能及时有效地出手。如果转换过程较为顺利，两三年就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长均衡点是多少还有待观察，可能有一个探底或“试错”过程，估计将落在6%~7%之间。

寻找新阶段的增长动力

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说法相比，“增长阶段转换”的表述有着更积极的含义。如果能够转换成功，进入新增长阶段，意味着将开启新的增长空间。尽管增长的速度有所放缓，但将由粗放转向精致，将更为讲究质量和效益，更加适合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将发生变化。新增长阶段将会具体体现这种变化。

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主要是“铺摊子”，新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而且是两个台阶，一个是“产业升级”的台阶；另一个是“创新”的台阶。在高增长阶段，主要发生的是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主要是工业）部门的转移。由于二者之间巨大的效率差异，这种部门间转移为国民经济的高增长提供了主要动力。进入新增长阶段后，“产业升级”与“创新”可能同时发生，但也有必要谨慎地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产业升级可以在不发生创新，依托技术引进或既有技术水平的条件下，通过行业内和行业间的优胜劣汰，减少低效率企业，提高平均效率水平而实现；而创新则强调的是通过形成新的技术、组织、管理方法、市场等而提升效率。在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中国在较多领域仍有一定的技术追赶空间，在既定技术水平下缩小效率差距的潜力很大；与

此同时，创新的重要性将逐步增加。

简单地说，以往 30 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主要由农业转向以工业为主的非农产业，一方面为农村大量的潜在失业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显著提升了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巨大的生产率差距^①，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进入新增长阶段后，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转移仍会持续，但速度逐步放缓，提升效率的重点将转向非农产业的行业内和行业间^②。国际经验表明，行业内的竞争和重组淘汰低效率企业，能够显著提升生产率（Foster 等，2008）。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加快，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也将趋近于非农产业的水平。这样一个变化图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过程。

在这一背景下，新增长阶段将可能涌现一系列新增长点。

基础设施投资。投资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如高铁、地铁，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设施等。问题是如何在防控风险、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促进投资增长。

城镇化。未来 20~30 年内，中国的城镇化率应该还有 20 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 2 亿多人。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 20 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有研究认为，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 30% 左右，相当于 6 个百分点的农民进城对消费的拉动效应。

产业升级。2010 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 23%，而日本是 31.4%，美国是 38.5%^③。如果通过产业升级，达到与日、美相同的水平，就有 30%~70% 的提升空间。

消费升级。收入倍增规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消费比重。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 2020 年将达到 45%。

更大程度、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通过改进贸易和投资活动，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如与基本建设能力相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2》的数据计算，1978 年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为 1:6.1，后来这个比例有所起伏，到 2011 年为 1:4.8。

② 尽管中国的要素配置效率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得到长足提高，但基于企业层面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中国的资本和劳动配置效率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 30%~50%（Hsieh 和 Klenow，2009）。

③ 这里日本的数据是 2005 年的。三个国家的增加率资料来源分别为：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增加值率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中国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工业统计数据计算。

关的对外贸易、劳务输出和投资等。

创新。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创新潜能。除了技术创新外，商业模式创新也不容低估。

围绕新增长点谋划和推动改革

日本、韩国等经验表明，高速增长期结束后，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期并不容易。上述新增长点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要使其逐步变为现实，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其中最为关键、难度最大的是破除制约这些新增长点潜能释放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这样，培育和启动新增长点，很大程度上就转化为新形势下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

十八大以后，改革的呼声较高，期待甚多。新一轮改革的复杂性超过以往，技术含量较高，应谋定而后动。就改革的策略而言，改革首先要有增长效应，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增长，在新一轮改革的初期尤其如此。否则改革难以得到有效支持而深入下去。其次要抓关键环节或突破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加上必要的配套改革，使新体制、新机制能够尽快并有效运转，进而把增长潜力持续不断地发掘出来。

由此出发，新一轮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围绕新增长点，抓住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推动改革，产生增长效应，使改革和增长互为促进。

以放宽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为突破口，发掘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潜力。例如，铁路部门仍有一定投资增长潜力，但铁道部负债率已经较高，融资能力受限。应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改革企业体制和投融资机制，引入行业外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内的新投资者。其他基础设施领域，如电力、石油、天然气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可能推进类似改革。

以加快土地、户籍、财税体制改革，提高集聚效应和生产率为突破口，稳步而持续地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需求潜力，但这种需求应该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依托于收入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城镇化主要优势在于集聚效应，包括从生产、流通、创新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上的集聚效应，从而产生传统农村经济难以比拟的高生产率。推进城镇化不仅仅是花钱消费，更重要的是提高生产率，是创造财富。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都会集中于发挥集聚优势、提高生产率这个基本问题上。下一步推动城

镇化，应当以提高城市的集聚效应和生产率为核心，推动土地、户籍、财税等制度改革，让人和地这两个基本要素更好地流动起来，促进优化配置，使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

以形成一批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重组和升级。增长速度放缓后，工业的快速扩张期基本结束，产业内的竞争和重组将会加剧，出现购并、重组的高峰期，从而提高集中度。产业之间也将有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从国际经验看，在深度参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等大型经济体，只能是一部分行业、而不可能是所有行业都具备竞争优势。中国究竟哪些行业能够胜出，最终取决于国内国际的市场竞争。这将是一个前面描述过的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提高效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基本职责是促成和保护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参与重组购并的各种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提供政策支持，并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网的保护。如何处置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是政府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此外，在国家层面，应当从长计议，制定规划，以识别、支持在今后二三十年具有稳定持续竞争力的产业。

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突破口，促进消费升级。从过去一些年的情况看，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消费的主导力量。这一势头将得以持续。应当通过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完善公共服务、发展消费金融等措施，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升其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促进在升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机会均等，提高社会的横向特别是纵向流动性，使更多的人通过发挥自身聪明才智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扩大消费。

以开放促改革为突破口，谋求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全球化机遇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从来都是国内国际相互促动的过程。国内的诸多改革，是通过对外开放而推动或“倒逼”的。这一经验今后仍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以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内金融体系改革；与有关国家达成自贸区协议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为契机，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特别是服务业领域的改革；与国际一流大学合作办学，带动国内大学教育体系改革等。继续推动企业“走出去”，利用国际研发、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并使之与国内产业链有机衔接。

以涌现一批创新型的行业领先企业为突破口，推动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必须创新。在现代产业生态体系中，多数可以通过引进吸收获取新技术，大量企业为掌握关键技术的龙头企业配套，